

明代诗话的分期与特点再认识

侯荣川^{*}

〔摘要〕 明代诗话演变发展的进程感,不仅在诗歌理论方面得到呈现,亦在叙述策略、结撰形式及传播方式等方面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形态与格局。综合明诗话内容、形式等要素对其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将之分为承续、前变、变革、创获、分化五个时期,分别梳理辨析其特点和价值,可以获得不同于诗学史、批评史分期的别样视角,并达到对明代诗话面貌特点切实而独特的把握。

〔关键词〕 明诗话;分期;特点;诗学发展

目前关于明代诗话分期及特点的研究,既有专门的研探,如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前言》、周维德《全明诗话·前言》、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等;亦有在整体诗话史视野下的审视,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及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关于明诗话的分期叙述的部分章节。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明代诗学发展的脉络,尤其是诗学流派的变化为依据来考察明代诗话的发展。如吴文治将明代诗话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洪武至成化),论诗多沿袭元人宗唐抑宋观点;中期(弘治至隆庆),特点是前后七子复古思想占据主流;后期(万历至崇祯),呈现出狂飙突起的变革特点,“公安”、“竟陵”成为诗学思想的代表^①。周维德认为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后期诗话的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宣扬个性解放^②。刘德重、张寅彭将明诗话分为初期(明初至宣德间)、中期(弘治至万历)、明末(天启、崇祯)三个时期^③。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设立“诗话之复兴”、“拟古主义诗话”、“反拟古主义诗话”的章节来叙述明代诗话的发展。此外,船津富彦将明代诗话分为台阁派诗人的诗话、古文辞派诗人的诗话、公安竟陵派诗人的诗话、其他等四类,分别介绍了《麓堂诗话》《谈艺录》等25种诗话,也具有历时性考察的价值^④。值得注意的是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已较多地以诗话体制作为分期的参考依据,将明代诗话分为四个时期:明初到成化年间,主要是记事诗话和诗格诗法著作;弘治间至嘉靖中,评论类的诗话著作开始增多;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各种诗话著作和诗法诗格著作明显增多;万历中后期至明末,诗学著作与诗歌大型选本的结合,成为新的特色^⑤。诗话作为重要的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13&ZD115)、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全明诗话叙录及考论”(14XZW0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

②周维德:《全明诗话·前言》,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③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页。

④[日]船津富彦:《明清文学论》,东京: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第8—20页。

⑤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诗学理论与诗歌批评的载体,以上几种分期将诗话内容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应该是合理的,在具体操作与现实接受上也有其简便的优势。但也应看到,诗话文体的发展,虽与时代文学思潮的变化相关联,然其变化的脉络性并非完全同步,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另一方面,明代作为文体与文体学成熟兴盛的时代,诗学文献的形式,就专著而言,除诗话外,还有总集、评点等,要揭示明代诗话文体的特质及其演变阶段并解释其内在与外在的原因,不着重于文体形式要素的考察,仅以诗学的分期标准及分期操作为主要参照的分期方法,事实上是无法胜任的。我们认为,诗话作为一种传统的诗学论著形式,其分期有别于文学史分期,也不同于诗学史、批评史的分期,应以诗话观念及诗话体制形式的演变作为主要考察依据,诗话文本所包含的诗学史、批评史内容,则是分期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诗话分期界限的年代标示上,研究者多以朝代分为界,在大致的时间范围上考察诗话的发展。这样操作的长处是强调了诗话发展的延续性,不足则是对各时期诗话特点认识的模糊和不确定,反映出实际上对分期标准的把握不清晰。但是精确的文体分期,并非人为地将历史的发展截断,而是要寻求并指示文体形式因素的复杂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所能够显示出的变革性特征。因此,我们采取以某一具有变革意义的作品出现的具体时间作为分期起点,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标示取前一时期的结束时间与后一时期开始时间相重叠的方式,以显示诗话发展的连续性。

关于诗话的时间归属,主要以诗话基本成书的时间为参考,如许学夷《诗源辩体》的写作与修订历时四十余年,此处以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六卷本的初刊作为其分期的时间归属。其次是作者在世时的刊行或抄录传播的时间,如李东阳《麓堂诗话》初次刊行在正德二年前,然林俊《答西涯翁》云:“得报知又乞休,又未蒙允。元枢大老,宗社生灵,士夫一大命脉也,容舍哉?……诗话捧读数遍,愈愧某体裁痴重。”^①李东阳第二次乞休在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②,可知《麓堂诗话》此时已开始流传,故以此年为诗话归属时间。此外,诗话中能够表明作者活动的时间、作者的仕履时间及生卒年,在以上信息均不足时,亦酌情作为分期的参考依据。依据以上标准,我们将明代诗话分为五个时期:一、承续期,洪武元年(1368)至正统十一年(1446);二、前变期,正统十一年(1446)至弘治十一年(1498)。三、变革期,弘治十一年(1498)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创获期,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分化期,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崇祯十七年(1644)。兹分述之。

一、承续期:洪武元年(1368)至正统十一年(1446)

明初,朱元璋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权统治与文化政策,对文人思想与文学创作形成前所未有的禁约与束缚,在此官方强势话语的引导之下,文人开始探求塑造新朝自身的文学品格,然就诗歌而言,无论是实际的创作,还是理论的建构,仍以沿袭元代为主,显示出承续的特点。此时期的诗话主要有两类,一是延续宋人诗话的特点,以纪事为主,兼及评品,如瞿佑《归田诗话》《妙集吟堂诗话》等。又如叶子奇《草木子·谈薮》、刘绩《霏雪录》,一般归入子部,而实际以谈诗纪事为主。其中所记诗人逸事尤其元代及明初故事,多有助于史实的判断。尤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有关唐宋诗之辨,如《草木子》云“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者独北乐府耳”^③,《霏雪录》云“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④,为明代崇唐抑宋诗学观之先导。二是以元人诗法著作为基础进行纂辑的作品,这是明初诗

①林俊:《见素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钱振民:《李东阳年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③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明正德刻本。

④刘绩:《霏雪录》卷下,明弘治刻本。

话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也最为复杂的一类,如傅若川《傅与砺诗法》等。比较这几种诗法汇编,主要是《诗法源流》、《诗法家数》(题杨仲弘先生述)、严羽《沧浪诗话》等几种宋元诗学作品的汇编或摘录,元时所传刻诗法著作多已佚亡,其保存实有赖于此类诗法汇编。且此类作品为明初学诗之人视同珍秘,对明代诗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林右《许廷慎诗集后序》后有《诗话》一篇,记许廷慎论诗之言,不足400字,题为《诗话》,可见出明初诗话文体之观念。

二、前变期:正统十一年(1446)至弘治九年(1496)

朱莫培《松石轩诗评》与周叙《诗学梯航》,在诗话观念与诗话结构形式上都具有创新性的特点,显示出明代诗话变革的迹象。只是一方面两者都未提出系统成熟的诗学理论,另一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较小,此时期更多的诗话还是处于酝酿变革的状态,故称为“前变期”。朱莫培《诗评后叙》云:“诗之有评也,钟嵘三品之前,盖未之闻焉。后之评诗,可嗣其美者,张芸叟而已。”^①将诗评的典范上溯至钟嵘《诗品》。是书自汉魏至元代,以时代为序,用象喻的方式评述历代诗人诗作,亦是对钟嵘《诗品》的模仿,令明初以来承袭北宋诗话“集以资闲谈”的格局开始发生改变。周叙《诗学梯航序》谓得其父所校录祖叔子霖、东吴王汝器二家所作《诗法》,重加编订,间以己意补之,题名《诗学梯航》。就其诗学观来看,其以初、盛、中、晚的四唐分期叙唐诗发展,显然源自高棅《唐诗品汇》;论五言古诗认为“必以汉魏为法”,律诗“必截然祖于唐人”,开后来复古派先声。就叙述结构而言,是书包括叙诗、辨格等六部分,涉及诗歌源流史、诗体论、作家作品论、创作论等各方面,受到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虽然仍是以引述前人观点为主,但与明初以摘录、汇编宋元诗法为主的风气相比,总体上显示出融汇众论、自成一说的趋势。《琼台诗话》是蒋冕袁辑其师丘潜生平吟咏,录其本事,略同吴沆后人辑《环溪诗话》之例。其中所记丘潜诗歌创作的过程,如关于多次和杨维禎《花游曲》等的记录,对于了解丘潜及当时诗坛风气的真实状貌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徐伯龄《蟬精隽》多有他书所不载之遗闻旧事,而记前人作品亦多录全篇,颇赖以传。此外张弼《玉枕山诗话》《六同诗话》《续梦诗话》,杨循吉《七人联句诗记》等均为记录诗人唱和、谈诗的单篇小文,亦题作“诗话”,于了解明人诗话观念上的更新颇有价值。

诗法汇编是这一时期诗话重要的形式。天顺间,史潜将其所得前人诗法抄本,加以编辑校订,刊为《新编名贤诗法》三卷;成化元年、二年,怀悦编刊《诗法源流》与《诗家一指》;成化十六年,扬州知府杨成刊《诗法》,这三部诗法汇编基本涵括了宋元诗法的重要叙述,在明代屡有重刊,流传最广。杨成在扬州时还编刊有《诗话》十卷,列宋人刘攽、欧阳修、司马光等十家,人各一卷,是现在所知最早集独立成书之诗话著作以存原貌的“诗话丛书”形式。此外还有分类纂辑之书,如单宇《菊坡丛话》体例大致仿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集古今人之话,言有及于论诗者”^②,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等二十六类,所辑宋元人论诗之言,多注出处,其中有原书已佚者,赖此以存。黄溥《诗学权舆》刊于成化五年(1469),旨在为学诗者指点门径,“定为名格、名义、韵谱、句法、格调等目”,然其“采摭虽广,考证多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

三、变革期:弘治十一年(1498)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

徐祯卿《谈艺录》和李东阳《麓堂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明代诗话变革时期的开始。这一变革体现

^①周维德:《全明诗话》,第1册第473页。

^②黎扩:《菊坡丛话序》,《菊坡丛话》卷首,周维德《全明诗话》本,第161页。

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对前代诗学资源的批判为开端，对诗话的性质功用进行反思，显示出文体自觉的特点；二是多数诗话都是在一定诗学观念尤其是复古诗学思想的指导下，所论诗学问题由前代的重视技法转向诗歌的美学风格，理论化色彩浓；三是在诗话的文本结构上显示出诗学史的特征。

徐祯卿《谈艺录》作于弱冠（弘治十一年）时，李东阳《麓堂诗话》刊行于正德初，其传播的时间今最早可追溯至弘治十四年（1501）。《谈艺录》在明清两代所获得的认可远较《麓堂诗话》为高，如李梦阳称“《谈艺》之文，超驾六朝”（黄省曾《续吴中往哲记》），王士禛云：“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渔洋诗话》卷上）《谈艺录》如此为人所称许，其原因大致在于对形上理论的追求、诗学理论的体系性和语言的华美三个方面。如所周知，诗话从欧阳修起，以散文笔记的形式与诗人逸事的叙述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严谨周慎的理论表达形式，语言上也以平实为主。其后诗话的重心向评诗与讲论诗法转移，其所预期的目标对象，亦由同志者转向更为广大的基层学诗者，服务于“观诗法”、“知诗病”及诸多作法之“用”，更无法形成缜密的体系架构，语言尤质俗不文。《谈艺录》以《文心雕龙》为典范，集中探讨诗歌本质、诗歌美学等宏观理论问题，基本不涉及个体批评和具体的创作技巧。在文体形式上，《谈艺录》虽亦由若干条目构成，但条目本身及条目间具有逻辑关联，以情感论为核心，与格调说相融合提出“因情立格”的诗学观，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活动、作品的既成形态、文学的欣赏接受过程等各个侧面也做了相当全面的阐述，基本“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以‘情’为核心的诗歌理论体系”^①，是对传统诗话条列式结构的突破，故胡应麟称“昌穀《谈艺》，可并《雕龙》”^②。《谈艺录》的叙述语言明净雅洁而又绮靡工致，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相较于前代诗话以叙事或议论为主，不工于言辞的风格，更易于为文人所激赏。李东阳《麓堂诗话》虽仍沿用传统诗话的形式，但其对诗话的发展还是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是推尊严羽诗论，奠定了严羽《沧浪诗话》诗学极则的地位，后来的诗话作者，如王世贞、胡应麟等都以《沧浪诗话》为诗论准则。二是以格调说论诗，推崇盛唐，反对宋诗，成为复古派的先声。三是提出“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③的观点。“诗话作而诗亡”在明清两代引发了关于诗话与诗关系问题的争论，成为诗话文体自觉的标志。杨慎“以博洽冠一时”，《升庵诗话》四卷、《诗话补遗》三卷以考证文献讹谬、搜剔篇籍遗逸为主，虽多纰漏，“然其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开明人诗话博识考证一路。

此时期仍有一定数量的汇编类诗话，但与前不同的是，丛书类的汇编较少，如王俊民（字用章）编《诗法源流》、黄省曾《名家诗法》等；更多的则是摘录类编，内容以辨体为中心。《诗学体要类编》为宋孟清弘治十六年任汉中训导时所编，“次诸家体制，原其始而缀其要”，涉及诗体流变、作诗法则等，意在“便于初学”。杨良弼《作诗体要》列古今诗体82种，举诗为例，复于此体之渊源流变或体式风格加以申说。梁桥《冰川诗式》是此时期较为重要的诗法类编，分定体、练句、贞韵等六门，所述涉及诗体、声韵、句法、诗格等，每类惟务穷尽，追求诗歌体式列举的完备，体现出明人追求诗学集大成的心态。是书在嘉靖、隆庆、万历间多次重刊，亦传入朝鲜、日本，影响较著。其流行既与其侄梁梦龙刊行推扬有关，其本身的诗学价值亦是重要的因素。以辨体为核心的诗话，还有潘援《诗林辨体》、黄佐《六艺流变·诗艺》、杨慎《绝句衍义》《绝句辨体》等。徐献忠《唐诗品》等专论某代，显示出明人诗学研探的范围之广。

① 廖可斌：《明代复古派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0页。

③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四、创获期: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

以对前代诗学资源的继承与变革为基础,加之众多诗话作者孜孜以求的热情与严谨的态度,明代诗话在嘉靖后期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数量看,现存220余种明诗话,本期有近100种,几乎占整个明代诗话的一半。在诗话写作的态度上,虽仍有部分诗话延续着自由轻松的叙事品评特点,但大多数诗话作者都是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如《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辩体》等都花费了作者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写作、修订完善,有些甚至寄一生心力于此,自觉地进行诗学的探究。从诗学理论的阐发看,在经过前七子复古诗学的风行一时与杨慎及王慎中、唐顺之等的质疑、批评之后,李攀龙、王世贞等于嘉靖后期重倡复古,在理论上需要对前期的诗学资源加以检视、批评与改进,其诗学观在不断地调适、丰富,呈现出成熟、完备的特点。就诗话的文本结构看,对诗史性写作的追求与实践是此时期诗话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对整个诗话发展最大的贡献。

作为此期开始标志的是王世贞《艺苑卮言》。《艺苑卮言》是王世贞针对徐祯卿、杨慎、严羽三家著述所未备,欲“有所扬挖,成一家言”的诗学论著。嘉靖三十七年完成初稿六卷后,隆庆六年至万历十七年多次刊刻,已达十六卷之多,是一个不断增益内容和修正理论的过程。王世贞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①,引入才思论以纠正格调论易陷入一味模拟的流弊,对前七子复古理论进行改造与补充。同时,《艺苑卮言》亦重视诗歌用韵、平仄以及篇章句字之法,力求将之融合在自身审美原则之中,实现二者的适洽。《艺苑卮言》卷一分类摘录古今诗文评论,涉及创作的功用、作品的意境、作家的修养及创作技巧等方面,卷二至卷五自上古《诗经》迄明朝,在世变的视野下评述历代诗人诗作,其中又融合了诗体演进的辨明,卷六至卷八记本朝诗人逸事为主,兼及品评,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另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明诗评》,取范钟嵘《诗品》,评鹭一百多位本朝诗人,其以价值品第与流派意识作为分卷的依据,是《诗品》之后少见的具有类似批评结构的诗学论著。

在胡应麟之前,有关诗歌体制流变与诗史正变已有相当多的探讨,源流品第与体制辨别成为诗歌理论阐发的基本方法被广泛使用,但正如钱钟书所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②,在一种诗学著作中以这两者来共同构建理论体系的实践,大概只有高棅《唐诗品汇》,“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③,有效地建立起唐一代诗史全貌。胡应麟借鉴了《品汇》的这一经验,以明确的诗史观为指导,来建构更为宏阔的周汉至明代“上下千古”的诗史。《诗薮》分为内、外、杂、续四编,内编六卷论杂言、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言近体、七言近体、绝句等。外编六卷与续编二卷叙评周汉至明历朝诗歌发展。杂编六卷分为两部分,遗逸上篇章列述先秦及汉古逸诗及辞赋,以辞赋为主,遗逸中列历代别集;遗逸下及闰余上、中、下论述北齐、北周、三国、五代、南宋及中州诗人诗作。这样,以诗体演变、诗史发展与作家品评构成的论述体系,既展示了诗史的总貌,又于品第升降中为学诗者指示门径。许学夷面对三袁、钟谭诗说流行,复古理论为人所厌弃的思潮,在胡应麟诗学理论的基础上,集中于诗体流变的辨析,其对诗歌体裁源流正变的分殊更为细密、详备,结构较《诗薮》亦更为整密圆融。在正、变关系上,以正为主,亦能发掘变的价值,对不同时代及诗人的艺术风格与成就能给以客观的分析与公允的评价,代表了明代乃至整个古代诗体研究的最高水平。冯复京《说诗补遗》八卷,卷一总论,提出“总论诗道,格律才情二者而已”^④的观点,卷二卷八论上古至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4页。

②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第3卷第8期(1933,10)。

③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④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一,清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下引同。

唐各代诗,唐以后诗不论。《说诗补遗》是明代诗话走向分化期的一个标志。首先,《说诗补遗》的诗学观承自复古派,尤其受胡应麟影响甚深,而冯班跋语述冯复京晚年自悔之言:“病榻尝诏班曰:王、李、李、何,非知读书者。吾向尝为所欺,汝辈不得尔。”是晚明至清初诗学分化的反映。其次,冯复京在诗学探讨上确是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如冯舒《说诗补遗跋》云冯复京自称“《说诗》一书,虽有遗憾,然一生目力尽在是矣”,显示出诗学理论上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冯时可《艺海洞酌》十一卷,论汉魏、晋、六朝、唐各代诗文,许学夷称其论诗“浮泛琐屑,而实悟者少。间涉训释,大多穿凿,至引古人诗句,则又似全不知诗者。又意在师心,耻于宗古,故盛推韩苏而无所避,此中郎之先倡也。但其资高学博,故于汉魏晋人大体,间亦有得”^①。又有《谈艺录》一卷,亦论文论诗参半,论诗部分泛论历代及明诗,以品陟本朝人诗为多,颇推尊王世懋,认为“王次公之诗胜长公”。此外,如顾起纶《国雅品》、孙鑛《唐诗品》、蒋一葵《唐诗评》、梅鼎祚《汉魏诗乘》《六朝诗乘》等,亦是有关诗史的描述,然多摘录前人论述,缺乏理论的创新。

此期其他一些诗话虽未采用诗史性叙述结构,但仍是以前诗学理论探讨为主,亦显示出理论的体系性,如皇甫汸《解颐新语》八卷,涉及总论、诗体源流、诗家评论等,虽多引前说,亦有己见。是书或仿徐祯卿《谈艺录》,然文辞神色实则远不相侔。谢榛《诗家直说》在格调之外提出“气格”的范畴,强调“诗乃模写情景之具”,进一步丰富了复古诗学理论。就诗话结构而言,其于理论的探讨与诗论、诗法等混杂无别,缺乏诗学体系建构的自觉。

王世懋《艺圃撷余》篇幅简短,无甚体系,亦不多做玄解,而持论通脱,不胶执格调之说,至云“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②,故有学者认为其不属复古一派,而近于性灵、神韵。反对格调说者,如江盈科《雪涛诗评》提出“趣”的范畴:“夫为诗者,若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即佳亦自无趣”,认为“真诗自古,不在模古”^③,然声势实微。其他以叙事为主的诗话,如李春熙《道听录》、王兆云《挥麈诗话》、胡之骥《诗说纪事》等。

这一时期的诗法类的作品如熊逵《清江诗法》、朱绂《名家诗法汇编》、周履靖《骚坛秘语》、王禔《诗法指南》、吴默《翰林诗法》等,汇编诗话如杨春先《诗话随抄》、俞允文《名贤诗评》、季汝虞《芸林古今诗话》等,转相抄撮,基本缺乏理论和文体价值。只有少数几部所抄录已佚诗学著作,如《诗话随抄》所抄《水南诗话》十七则,可以与《水南稿》中两卷诗话一起基本恢复《渚山堂诗话》的原貌,具有文献辑佚的价值。

五、分化期: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崇祯十七年(1644)

万历末期,明诗话的兴盛已难以为继,进入分化时期。首先,在诗学观上,经过公安、竟陵等的批判与自身观点的调整后,复古诗学虽仍占有一定地位,但主流诗学走向分化却是一种必然。赵宦光精通音声之学,故论诗多注意声调,认为“诗以声为体,故曰风骨”,“去声调,非诗矣”^④,于救正复古派格调诗学之偏弊殊有贡献。联系清初及乾嘉时期神韵诗学、声调谱之类著作的盛行,其间脉络亦宛然可辨。就结构而言,《弹雅》十六卷,分为雅俗、声调、格制等十一篇,依据诗歌之体性、结构、作用等内在层次分殊叙次,建立起相当系统的诗学分析与评价体系,相较《诗数》等的以史为纲的结撰形式,则更具有精严缜密的理论品格。又如谢肇淛《小草斋诗话》五卷,分内、外、杂三篇。内篇总论,外篇上述六朝至唐宋元明各代诗及作诗之法,皆有关诗学;外编下评论唐宋至明作品及闽人诗,杂篇则“摭摭宋、元以来近人佳句

①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7年,第349页。

②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0页。

③江盈科:《雪涛小书诗评》,周维德《全明诗话》本,第2766页。

④赵宦光:《弹雅》卷二《声调》,明天二年刻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遗事”。谢氏论诗多在诗之“悟”、“情”、“趣”等，并不拘执体制格调、取法须上等等，故张健教授认为谢肇淛倾向是在拟古与性灵两派之间作调和^①。这种由“格调”为中心诗歌美学的偏转，更突出地体现在“神韵”说的成熟。如陆时雍认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沈；有韵则远，无韵则局”，所谓“韵”，即是与复古派好壮大，公安、竟陵好奇怪不同的诗歌风格：“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②另一种是对复古诗学大加抨击，务摘其谬，如冯舒作《诗纪匡谬》，欲力破李攀龙、钟惺“邪说”，而“匡及于《纪》，曰正其始”。（冯舒《诗纪匡谬引》）其次，与胡应麟、许学夷等上下千古，追求宏大诗史叙事的努力不同，此期的诗话多专力于某代、某人的研究，如胡震亨《唐音癸签》三十三卷，采用前人有关唐诗之说，间附己意，分体凡、法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等，《四库全书总目》称“三百年之源流正变，犁然可按，实于谈艺有裨”。又如董斯张《笺杜陵诗十二则》（《吹景集》卷六）、唐元玘《杜诗臆》四卷、卢世淮《读杜私言》一卷、王嗣奭《杜臆》十卷等，均是有关杜诗学的研究。还有一些诗话多叙诗人逸事，如徐燊《笔精》、《榕阴新检》，陈继儒《余山诗话》、陈基虞《客斋诗话》等；或以评论诗作为主，而仅出于个人好尚，无意于诗学指导，如支允坚《艺苑闲评》自序云：“雌黄往哲，橐籥后进，是非余志也夫。”^③又如叶廷秀《诗谭》十卷，所辑诗话半录旧文，半出己论，自序称“以为谭诗也可，谭道也可”，所关注者在于“忠孝大道理”^④，非专力诗学，故四库馆臣云：“其人虽风裁岳岳，而论诗则不可为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七）其他如王良臣《诗评密谛》、高奭《艳雪斋诗评》、雪畴子《绿天耕舍燕钞》等，专事抄撮，虽无诗学理论价值，但是对考察明代诗学风气还是有所帮助。

综上所述，明代诗话是在宋诗话偏于叙事、元代诗法惟重格法的基础上以诗体辨别、审美确认与诗史批判为核心建立起系统的诗学理论。总的来看，明诗话所探讨的诗学问题，主流是复古派的“格调”诗说；在诗学理论的建构上付出巨大努力，对明代诗学，同时也对中国传统诗学贡献最大的也是复古论者。所谓“格调”，其实质首先是风格美学，李、何、王、李等复古诗人意欲独辟汉唐之后诗歌高标的愿景，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复三代之隆”的国家追求的一翼，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为基础。明人诗歌复古实践的成败与否姑且不论，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及创作指导的诗学建构，尤其在对前代创作、理论的总结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责任编辑：邓晓东）

Periodization and Features of *Shihua* in Ming Dynasty

HOU Rong-chuan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shihua* 诗话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in the Ming Dynasty are not only well reflected by the achievements in poetic theories but the shaping of the complicated pattern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textual structure and mode of circulation as well. On the basis of an examination of such elements as content and form, the development of *shihu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continuation; pre-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ccomplishment; and division.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each period will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poetic creation and criticism, thus capturing the real features of *shihua*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hihua* of Ming Dynasty; periodization; features; development of poetics

①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②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分见第1423、1412页。

③支允坚：《梅花渡异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55页。

④叶廷秀：《诗谭》自序，《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18册，第73页。